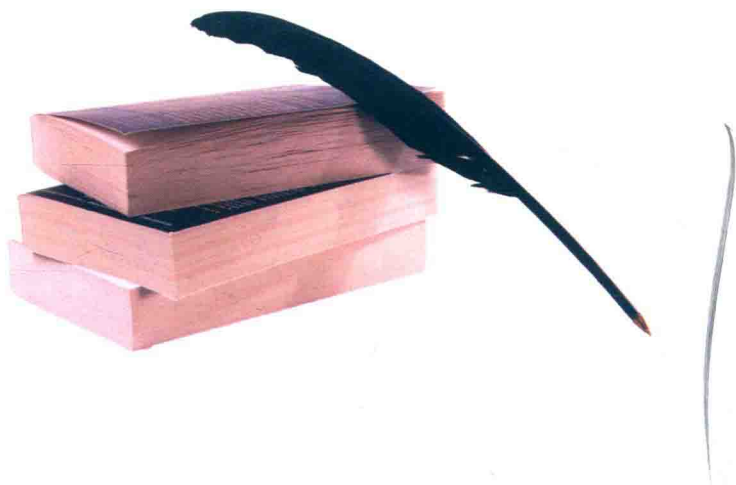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4YJC752028）成果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文库

杨
保
林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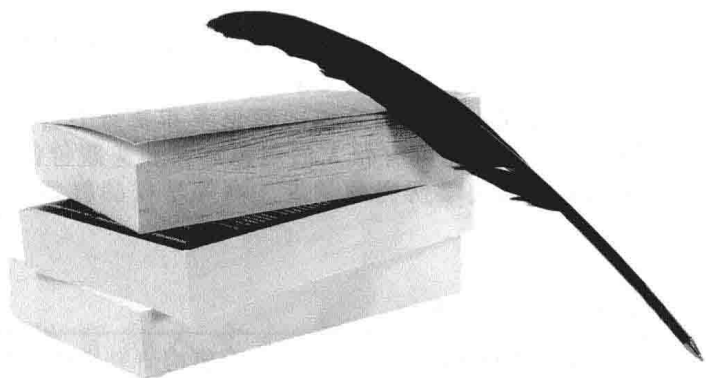
澳大利亚当代小说中的 亚洲想象与民族神话建构研究



科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4YJC752028）成果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文库

杨保林
著



澳大利亚当代小说中的 亚洲想象与民族神话建构研究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后殖民主义为理论视角对澳大利亚当代主流作家创作的旅亚小说进行研究,旨在分析澳大利亚当代小说中亚洲形象刻画的特征及其变迁,并进一步厘清澳大利亚当代作家的亚洲形象表征及自我民族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澳大利亚当代旅亚小说都以亚洲国家和人物为表征对象,他们对亚洲所做的想象性表征折射出澳大利亚人亚洲观的变迁。同时,笔者认为澳大利亚当代主流作家对亚洲的表征反映了他们对自我民族身份定位的新思考和新努力,这对我们深入了解澳大利亚文学及文化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本书适合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高等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以及热爱文学的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澳大利亚当代小说中的亚洲想象与民族神话建构研究 / 杨保林著.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7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文库)

ISBN 978-7-03-057928-7

I. ①澳… II. ①杨… III. ①小说研究—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1144 号

责任编辑: 常春娥 / 责任校对: 张小霞

责任印制: 张欣秀 / 封面设计: 铭轩堂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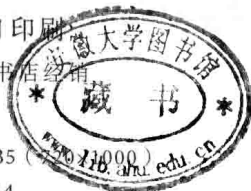
2018 年 7 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

2018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4

字数: 227 000

定价: 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杨保林，1982 年生，甘肃甘谷人，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甘肃省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访问学者。研究兴趣为后殖民英语文学、澳大利亚当代小说与戏剧。近年来在《当代外国文学》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10 余篇，出版译著 3 部；获得“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等教学科研奖励 10 余项；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 项，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 1 项，澳大利亚外交外贸部澳中理事会竞争项目 3 项。

本书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省级重点学科及校级
优势学科资助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旅行文学、异域想象与文化身份	1
第二节 澳大利亚当代旅亚小说及其研究	11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目的、方法及内容	21
第二章 “近北”之魅：《危险年代》中的幻想诱惑	25
第一节 “真实的”国家与想象的地域	31
一、亚洲现实的不堪	34
二、哇扬皮影的魅力	39
第二节 双重性：澳大利亚后殖民文化身份反思	48
一、人物的双重性	52
二、社会的双重性	55
三、民族的双重性	58
第三章 亚洲之惧：《丛林酒吧里的呐喊》中的现实焦虑	65
第一节 东南亚“新闻故事”	73
一、亚洲之“酷热”	75
二、亚洲之“艳遇”	80
三、亚洲之“暴力”	85
第二节 澳大利亚的民族焦虑	90
一、焦虑的“文化包袱”	92
二、焦虑的“症候表现”	96
三、焦虑的消解途径	100

第四章 探索之惑：《长安街》中的文化疑忌	105
第一节 中国的“秘密”	116
一、中国传统文化之“秘密”	119
二、中国社会现实之“秘密”	124
三、中国人之“秘密”	129
第二节 澳大利亚的民族疑忌	135
一、逃遁	137
二、怀旧	141
三、回归	144
第五章 认同之问：《祖先游戏》中的身份批判	150
第一节 想象中国	157
一、叛逆与重生	160
二、和解与传承	163
三、想象与超越	166
第二节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身份再现	170
一、再现历史：澳大利亚的开拓者	173
二、正视现实：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澳大利亚	177
三、他乡即原乡：澳大利亚国家认同	182
第六章 结论	188
参考文献	202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旅行文学、异域想象与文化身份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文学迈入“新多元”(the new diversity)的时代,出现了女性写作、土著写作、地域写作、旅行写作等诸多文学现象。由于许多澳大利亚作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纷纷前往欧洲、亚洲和美国等海外地区和国家,随后创作出版了不少旅行文学(travel literature)作品,因此,澳大利亚旅行文学发展较快、成果颇丰。越南战争(Vietnam War)以后,澳大利亚开始积极“转向亚洲”(turn to Asia),澳大利亚人的旅亚活动明显增多,澳大利亚文坛也兴起了“亚洲写作”(Asia writing)的浪潮^①。在此之前,许多澳大利亚作家就曾游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随后创作出版了数量可观的旅亚作品^②,然而,早期旅亚作

① 澳大利亚著名文学评论家布鲁斯·本尼特(Bruce Bennett)认为越南战争后澳大利亚文学领域出现了两股“亚洲写作”热潮,其一为以克里斯托弗·考什(Christopher Koch)、罗伯特·德鲁(Robert Drewe)、布朗西·达普杰(Blanche d'Alpuget)为代表的欧裔澳大利亚作家,其二为以易天鸿(Ee Tiang Hong)和布莱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等为代表的亚裔澳大利亚移民作家(具体参见 Bennett, 1998: 263)。

② 例如盖伊·布斯比(Guy Boothby)的《美丽白鬼子》(*The Beautiful White Devil*, 1896),努尔玛·韩福德(Nourma Handford)的《草叶血:一部马来西亚当代小说》(*Blood on the Leaves: A Novel of Present-day Malaya*, 1953),G. M. 格拉斯金(G. M. Glaskin)的《太阳下的狮子》(*A Lion in the Sun*, 1960)、《挚爱沙滩》(*The Beach of Passionate Love*, 1961)等。

品大多充斥着东方主义话语与文化偏见，对亚洲的表征往往囿于“滞定型”（stereotype）刻画。此外，由于早期的旅亚作家在澳大利亚国内通常被视为非严肃（non-serious）作家，因此，他们的旅亚小说也被视为“非澳大利亚的或非主流文学”（Koh, 1993: 21）。澳大利亚国内“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的阴霾与冷战思维，使澳大利亚人视亚洲人为异己或宿敌，所以，以亚洲为题材的作品当然不能和描写“澳大利亚生活方式”的主流文学相提并论。

澳大利亚当代作家对亚洲的表征较以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澳大利亚主流（英裔白人男性）作家在越南战争之后对亚洲的认识有所转变，他们在“转向亚洲”的过程中对亚洲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因此，他们的旅亚作品对亚洲的表征相较于以往也有所不同。澳大利亚当代旅亚小说是如何表征亚洲的呢？这种亚洲表征的背后又流露出澳大利亚主流作家怎样的亚洲观和对自我身份的认识呢？本书将以此为核心对澳大利亚当代旅亚小说进行深入阐释。

本书主要对四位澳大利亚当代白人男性作家创作的旅亚小说进行具体研究。这四位作家及其作品分别为克里斯托弗·考什（1932—2013）及其小说《危险年代》（*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 1978）、罗伯特·德鲁（1943—）及其小说《丛林酒吧里的呐喊》（*A Cry in the Jungle Bar*, 1979）、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 1952—）及其小说《长安街》（*Avenue of Eternal Peace*, 1989）、阿历克斯·米勒（Alex Miller, 1936—）及其小说《祖先游戏》（*The Ancestor Game*, 1992）。这四位澳大利亚作家都曾游历或旅居亚洲，而后创作出版了旅亚小说。克里斯托弗·考什在澳大利亚文坛享有盛誉，迄今已有十部虚构与非虚构作品问世，他的小说屡获大奖，包括两次“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Miles Franklin Award）^①。本书

① “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是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文学奖项之一，克里斯托弗·考什的小说《双面人》（*The Doubleman*, 1985）与《通往战争的高速路》（*Highways to a War*, 1995）先后获得此奖。

所研究的《危险年代》荣获 1978 年的“《时代报》年度图书奖”（*The Age Book of the Year Award*）与 1979 年的“国家图书协会奖”（*National Book Council Award*），该小说的背景设在印度尼西亚。罗伯特·德鲁是具有新闻职业背景的作家，《丛林酒吧里的呐喊》背景主要设在菲律宾。尼古拉斯·周思迄今已有十多部作品面世，他曾在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任文化参赞并在中国的大学里任教，其小说《长安街》曾入围“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的决选名单（shortlist），该小说的背景设在中国。阿历克斯·米勒迄今也有十余部小说问世，其作品多次问鼎著名文学奖项^①，《祖先游戏》荣获 1993 年度的“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该小说的背景主要设在澳大利亚与中国。

英国著名哲学家及作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其散文《论旅行》（“Of travels”）中曾谈及异域旅行对个人成长的促进作用。旅行^②作为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重要实践活动，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旅行的动因很多，或为受人驱逐的无奈之举，或为躲避战乱的主动行为，此种意义上的旅行大多是痛苦的体验，感受到的不是愉悦而是创伤；旅行也与娱乐休闲、异域探险紧密相关，此种意义上的旅行大多与体验异质文化、实现自我价值有关。旅行具有文化传播与消费的功能，旅行文学作为旅行体验的文化书写，对旅行这一实践活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前现代时期的旅行者有车马舟楫之便，现代旅行者更是借助火车飞

① 阿历克斯·米勒的多部小说曾入围“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的决选名单，除小说《祖先游戏》获得此奖之外，小说《石乡行》（*Journey to the Stone Country*, 2002）获得了 2003 年度的“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

② 旅行写作研究专家保罗·法索尔（Paul Fussell）曾对探险（exploration）、旅行（travel）与观光旅游（tourism）做过明确区分，他认为探险本身是一种殖民化的形式，旅行则涉及对已知事物的探索，而观光旅游更多地呈现出商业化和大众化的形态（参见 Paul Fussell. *Abroad: British Literary Travelling between the Wa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本书研究的澳大利亚当代旅亚小说中的澳大利亚人物既非以领土扩张和经济掠夺为目的的殖民者（colonist），亦非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观光客（tourist），而是以探索异域进而实现自我认知为目的的旅行者（traveller）。

机汽车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纵横四海。旅行的普及促进了旅行文学的发展，而旅行文学反过来激起了更多人旅行的欲望。在文学批评家眼里，旅行及旅行文学不仅是休闲娱乐的衍生品，更是特定社会历史语境的生产物，有着更深层次的指涉。旅行的普及及旅行文学的大量涌现与西方自文艺复兴运动以降兴起的工业化进程和殖民主义扩张关系密切，悉尼大学英文系澳大利亚文学教授罗伯特·迪克森（Robert Dixon）在考察了旅行写作与殖民统治之间的关系之后指出，旅行文学与殖民扩张及统治之间存在一种隐性的共谋关系（Dixon, 2001: 22）。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贾斯丁·爱德华兹（Justin Edwards）也认为旅行文学是“巩固殖民统治的殖民主义话语”（Edwards, 2008: 76）。

旅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叙事，旅行写作研究专家保罗·法索尔就认为只有善于说谎的人才能成为优秀的旅行作家，“因为如果旅行者不在其叙事中掺点虚构小说的灵魂和技巧的话，那就没人愿意听这故事了。”（Gerster, 1995: 21）旅行文学的虚构性主要表现为对异域的想象性表征，而这种对异域的想象性表征最终都指向自我认知的维度，正如道格拉斯·科尔（Douglas Kerr）与茱莉亚·库恩（Julia Kuehn）所言，“旅行是一种探索，而所有的旅行都是一种发现自我的形式、一种感知自我的模式。”（Kerr & Kuehn, 2007: 5）

东西方的文学传统大相径庭，但在旅行与文学的关系这一层面存在诸多共同之处。荷马史诗中描写的英雄历程、《圣经·旧约》中关于摩西引导犹太人逃离埃及的记载、中世纪的圣杯传说与骑士冒险传奇都与旅行相关，而中国文学经典《离骚》《西游记》等无不与旅行密切相关。但是，要将旅行文学作为一种特定文学范畴进行系统研究的话，以上说法由于指涉面太广而显得较为空洞。旅行写作（travel writing）包括以旅行为主题的诗歌、散文、小说、日志、书信、传记、回忆录、见闻札记等虚构与非虚构（non-fiction）作品，并非所有的旅行写作都是旅行文学，如“苏州园林导游词”“天水麦积山石窟旅行攻略”等就不属于旅行文学的范畴。游记（travel book）或旅行见闻（travelogue）是一种特殊文类，属于非虚构作

品,旅行写作研究专家简·波尔姆(Jan Borm)认为旅行写作或旅行文学“不是一个文类,而是一个集合术语,指那些以旅行为主题的虚构或非虚构文本”(Borm, 2004: 13)。本书则认为旅行文学比旅行写作更加具体,从文类范畴上讲,旅行文学是旅行写作的亚类;从主题层面上讲,旅行文学是指以旅行(包括空间旅行与时间旅行等)为核心主题的虚构作品。

旅行文学源远流长,但受社会历史语境的制约,其发展较为缓慢。西方现代化进程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旅行文学的创作与被接受,但旅行文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亚类文学,被主流批评话语所忽视。自20世纪90年代起,旅行写作(包括旅行文学)的研究逐渐吸引了西方文学批评家的注意,丹尼斯·珀尔特(Dennis Porter)的《困扰的旅行:欧洲旅行作品中的欲望及越界》(*Haunted Journeys: Desire and Transgression in European Travel Writing*, 1991)、玛丽·露易丝·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帝国之眼:旅行写作与文化转变》(*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1992)等著作的出版宣告了旅行写作批评时代的到来^①。澳大利亚学者对旅行文学的关注与研究并不落后,劳瑞·赫根南(Laurie Hergenhan)与厄姆特劳·彼德逊(Irmtraud Petersson)于1994年编辑出版了《换位:澳大利亚作家在欧洲》(*Changing Places: Australian Writers in Europe*)一书,此外,罗斯·佩斯曼(Ros Pesman)、戴维·沃克(David Walker)与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于1996年编辑出版了《牛津澳大利亚旅行文学选》(*The Oxford Book of Australian Travel Writing*),这些著作都以澳大利亚旅行文学为研究对象。1997年,唐纳德·罗斯(Donald Ross)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组织了第一届国际旅行写作大

^① 严格说来,丹尼斯·珀尔特和玛丽·露易丝·普拉特等主要以非虚构类旅行写作为研究对象,为研究方便,本节涉及的范围包括虚构与非虚构的旅行写作,但以虚构类旅行写作为中心话题展开。

会并成立了“国际旅行及旅行写作协会”，由蒂姆·杨格斯（Tim Youngs）主编的学术期刊《旅行写作研究》（*Studies in Travel Writing*）也于同年出版发行。受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等的后现代理论的影响，旅行文学批评广泛关注旅行文本中的知识权力、性别政治、殖民主义话语等因素，迄今已有相当数量的旅行文学研究成果得到出版和发表，引起了众多文学批评家的关注。

旅行文学批评主要以后殖民理论与后结构主义等为研究范式，这是因为殖民主义扩张与旅游业的兴起使旅行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常态，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不断发展，旅行写作（旅行文学）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元素，显示出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西方殖民者对东方财富的觊觎，丹尼尔·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加剧了西方社会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玛丽·露易丝·普拉特在《帝国之眼：旅行写作与文化转变》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旅行作品在帝国读者当中广受欢迎，是因为旅行作品给阅读公众“创造了好奇、激动、冒险的感觉，甚至激起了对欧洲扩张主义伦理的狂热心态”（Pratt, 2008: 3）。正是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和旅行文学的双重作用下，无数的帝国开始了探索之旅，他们的足迹遍布全球，对亚、非、拉等地区造成的影响尤其深远。当代著名作家牙买加·金卡德（Jamaica Kincaid）在其作品《小地方》（*A Small Place*, 1988）中如此控诉西方殖民主义的危害：

你们来了。你们拿走了本不属于你们的东西……你们杀了人。你们把别人关押起来。你们抢劫别人。你们开了银行，却把我们的钱存在里面。账户上写着你们的名字。银行也在你们名下。你们当中肯定也有好人，但是他们在家里待着。^①

（Kincaid, 1988: 35）

① 此处译文为笔者所译。

贾斯丁·爱德华兹在《后殖民文学：本质批评导论》（*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 Reader's Guide to Essential Criticism*）一书中评论道，牙买加·金卡德的《小地方》表明“旅行者并不是坐在那里欣赏风景的消极主体，而是文化消费与剥削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这一过程建立并延续了欧洲的殖民统治。”（Edwards, 2008: 74）旅行文学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了西方的殖民主义进程和现代意识形态，而西方旅行者在关于殖民地或异域知识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中无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无论是对异域的“白描”讲述，还是关于异域的想象性虚构，旅行文学普遍强调异域知识的“真实性”（authenticity），但是，旅行文学的真实性受作者意识形态的影响，反映的不一定就是事实，相反，旅行文学中关于异域的 knowledge 往往基于作者对异域的想象性建构。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Orientalism*, 1978）和《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等著作中曾多次强调旅行文学（尤其是小说）“在帝国主义的态度、指涉和经验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爱德华·萨义德，2003：2）可以说，在西方作家创作的旅行文学中，不仅东方被神化了，其他殖民地或异域风土也被神化了。

萨义德认为西方知识范畴内的东方不是真正的东方，而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幻想产物，东方主义话语没能描述真正的东方（the actual Orient），但反映了西方想象的显著神话。（Levin, 2008: xi）东方本来是一个相对的地理概念，但在西方知识分子的描述下逐渐演变成一个文化概念，继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现代东方由于历史及社会等原因而落后于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贫穷落后、愚昧低劣的代名词。西方旅行作家笔下的东方几乎千篇一律：或千疮百孔、民生凋敝，或放纵奢靡、荒淫无度。由于西方旅行作家亲历过东方社会，他们笔下的东方往往被赋予了“真实性”的色彩，这使那些未曾有过东方经历的西方读者如同身临其境，以为获得了关于东方的真正知识。这种建构在西方想象中的东方神话在西方旅行作家的笔下不断

被强化，并得到了西方读者的普遍认同。无论是旅行作家还是其读者，他们在这种旅行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关注的是异域情调，东方究竟为何物，他们并不在意。正如澳大利亚作家阿历克斯·米勒的小说《祖先游戏》中的人物所说的那样：“如果我去了中国，那叫我怎么想象它？我在乎的不是寻访中国。让我感兴趣的不是中国而是对它的想象。”（Miller, 1992: 289）

《祖先游戏》中的说辞并非毫无道理，如同前文提到的那样，旅行文学作为虚构性作品，如果离开了想象，恐怕就变成旅行见闻或札记而显得缺乏创意和深度了。不过，尽管旅行文学是虚构的，但其毕竟离不开现实的参照，尤其对于具有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澳大利亚作家而言，现实与虚构在小说中的交相映衬则更为明显。克里斯托弗·考什在其小说《危险年代》中就强调，小说中的所有人物纯属虚构，只有公众人物除外。考什的小说背景设在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故事讲述了印度尼西亚政变前后一些西方记者在雅加达的生活与经历。《危险年代》首次出版于1978年，距当年的政变已有13年，而考什曾于1968年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委派，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成员的身份造访雅加达，看到当时的印度尼西亚“到处都弥漫着猜疑”（Koch, 1993: 20）。考什在雅加达的工作生活经历无疑给他的小说提供了素材，同时也给其小说赋予了一种真实性色彩。印度尼西亚虽然位于澳大利亚的北部，但长期以来被继承了西方知识体系的澳大利亚人视为“东方”，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澳大利亚所忽视。考什属于最早将创作眼光转向亚洲的澳大利亚白人主流作家之一，《危险年代》由于其曲折新颖的故事情节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赢得了澳大利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关注，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考什的文学创作声誉。然而，由于考什的创作受东方主义思维的影响，《危险年代》里的印度尼西亚社会充斥着异域情调，而贫穷与战乱都是该小说情节中常有的片段。

旅行文学对异域的想象性表征往往与自我身份的建构相辅相成。爱德华·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指出，“每一种文化的发展与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

的存在。”（爱德华·萨义德，2007：426）萨义德进一步论述道：

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的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

（爱德华·萨义德，2007：426-427）

自我身份作为一种人为建构的产物，不仅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而且始终需要建构不同的“他者”以便进行比照，旅行及旅行文学为此提供了诸多可能。

旅行既有时间的跨度，又有空间的位移，旅行文学作为旅行体验的文化书写，对自我文化和异质文化必将做出一番比较，因此，旅行文学“极易产生自我-他者的身份意识和历史的比照玄想”（周宪，2006：115）。旅行文学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重视异域情调与自我认知的关联性。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但彼此之间的认识仿佛是铁板一块，大多数的情况下对彼此只进行集体想象。中国古典文学中对西方的描述即有“妖魔化”之嫌，近代中国对西方的想象则是“坚船利炮”等；西方对东方的想象也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对古代东方文明的赞誉与对现代东方社会的鄙夷，这正是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所论述的。这种集体想象的不同之处在于，“东方想象是服从欧洲中心意识的，西方想象是服从中华（东方）中心意识的”（李岚，2007：21）。

自文艺复兴运动以降，海洋交通在世界文明史上扮演起了重要的角色，海洋文明的发达无疑促进了西方的殖民主义进程，西方旅行者也因此受益匪浅。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帝国主

体借助先进的海洋交通工具，在全球范围内从事殖民活动与旅行探险。尽管殖民主义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但不可否认，新殖民主义又以各种形式凸现出来并影响着世界格局与人文观念，正如考什所说的那样，许多前殖民地国家虽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在文化及思想意识方面仍然带有殖民主义印痕，而曾经是殖民主体的西方国家，在现代社会依然延续着其殖民主义思想意识，只是换了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旅行文学对促进异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功不可没，但其隐含的殖民主义思想意识往往被忽视乃至遗忘了。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世界霸主，当时的旅行作家对东方或其他殖民地的描写并非出于“好奇”这么简单，在意识深处，这些旅行作家将殖民地作为参照来考量自己的文化身份：异域的奇特及落后正好印证了帝国的正统及强大。西方的殖民扩张及统治在 20 世纪中后期的解殖活动中土崩瓦解，但这只是政治意义上和军事意义上的，在文化领域并非如此。旅行活动替代了原来的殖民扩张，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延续着帝国思维。旅行作家以“注视”“观看”前殖民地的方式，通过“记录”和“描写”前殖民地社会及人民，继续行使着帝国权力，这种“注视”与“描写”不只强调异域情调，还具有自我认知意义。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作家“借助东方来改变当时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而东方兴趣的兴起与英国社会上层日益增强的精英意识以及社会、文化责任感密切相关。”（空草，2009：233）同样，后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作家对异域情调的描写也与建构自我文化身份有关。

澳大利亚曾是英国的定居者殖民地（setter colony），与亚洲的近邻关系原本可以使其成为最熟悉亚太地区（Asia-Pacific region）的英语国家，但澳大利亚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澳大利亚人继承了欧洲人的东方主义思维”（Broinowski，1992：14），因此，澳大利亚旅亚作家笔下的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等亚洲国家仍然充斥着神秘感以及“他者”性质。澳大利亚文学中的旅亚小说数目可观，这些旅亚小说或多或少都带有英国/欧洲中心主义烙印。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可以被视为澳大利亚文学中旅亚写作的分水岭：此前的澳大利亚作家大多对亚洲